

热历史

中国马画之审美

□叶志强

马于农耕，名列“六畜”，替人劳作，亦供坐骑。马性刚烈，驰骋征战。老马识途，为人引路。古人喜马，《诗经》中就有21首诗中含有“马”。

马自古就是奋发威猛的象征。汉武帝得到乌孙马和大宛汗血马后，非常兴奋，挥笔写下了两首气势浩荡的《天马歌》。唐太宗李世民，为了追念征战四方的战马，刻写了“昭陵六骏”。“六骏”工笔线描的技法影响深远，深深影响了后世画坛。

在文学作品中，宝马往往配英雄。《三国演义》中，以义勇著称的关羽，骑的是千里赤兔马；勇冠三军的张飞，骑的是乌龙踏雪马；单身救主的赵云，骑的是照夜玉狮子。

马画盛于汉代，我们可以从汉画像石、画像砖、铜塑、石雕、壁画、漆画等文物中，窥见汉代马画盛况之一斑。及至魏晋南北朝，有不少名家画马，如晋之史道硕、戴逵，南朝宋之陆探微，南朝齐之毛惠远，北朝的杨子华。到了唐朝，爱马蔚为风气，画马高手如林，曹霸、韩干二公就像唐诗中的李杜一样。他们都是画马高手。杜甫赞扬曹霸画马是“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苏轼赞扬韩干画马，专门写了一篇《韩干画马赞》，说他画的马像“贤大夫”“贵公子”，高超脱俗，昂首傲世，闲适自得，自成一格。

古今马画，布局各异，形态有别。画面布局有独骏画、二马图、三骏图、四骏图、五马图、十骏图和百骏图等。马之形态，或动或静，或卧或立，或驰骋原野，或饮水溪边，或翻滚嬉戏，或仰天呼啸。画马不只讲究形似，更讲究马画的“象外之象”“画外之音”，有所寄托，有所寓意。

宋代是中国文人画的鼎盛期。“白描大师”李公麟就是北宋的大画家，出身书香门第，博学多识。他的代表作《五马图》受到



▲关羽与赤兔马

苏轼、黄庭坚、米芾等文人书画家的推崇，对中国马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画面是五名从西域而来的奚官，各牵引一匹马，向大宋朝廷进贡。画法很别致，五匹鞍马都是用线条勾勒的，马体用蔬菜条勾勒，蓬松散乱的马毛用“高古游丝”工描，加之着色淡墨晕染，晕处色块显出了结构性，染处色斑体现了层次性，线条与敷色的巧妙结合，使马栩栩如生。李公麟的这种技法被称为“白描”，后世称他是“白描第一人”。《五马图》因开创白描之先河，给后人提供了鞍马画的范本，被后人称为“宋画第一”。白描技法传承至今，成为当今中国画学习者的必修科目。

元代虽不足百年，但是文人画依然有所发展，画史往往宋元并举。但元有别于宋，画家的地位低下，内心抑郁，常常托马言志，借画喻情，画马“非以遣兴，即以写愁而寄恨”。现藏于故宫的元画《二马图》就是一例。此画作者任仁发是元代书画家，他书学李邕，画学李公麟。他用隐喻的手法画了一肥一瘦两匹马，两相对比，寓意深刻。左边一匹马骨瘦如柴，低着头，步履蹒跚，疲惫不堪；右边一匹马膘肥体壮，昂首挺胸，神采奕奕，轻快前行，

洋洋得意。作者在画的题跋中感叹“廉滥不同，而肥瘠系焉”。他将画中的肥马比喻成为贪官，吸食民脂民膏，故而肥壮；将画中的瘦马比喻为廉明勤政的清官，因忙于政务而累得皮毛剥落，骨瘦如柴。作者为元代终生不得志的士大夫鸣不平，借以表达自己刚正不阿的心态。此类以画喻人的画风，在宋元乃至明清的画中是屡见不鲜的。

近代以降，出了一位马画的集大成者徐悲鸿。他学贯中西，集世界绘画艺术之精粹，大胆探索中西合璧的画马艺术。早在1925年，康有为就这样评价他的马画：“精神华妙，隐秀雄奇；独步中国，无以为偶。”其马画最大特点是物我合一，以马写我。徐悲鸿出身贫寒，自幼随父学画，年末弱冠就挑起了养活七口之家的生活重担。只身去上海复旦大学半工半读，每天仅以一个糍粑充饥。为了寻求画技的突破，他怀揣改革画学的使命，背负辞旧求新的担当，远去法国留学。崇高的追求涵养了他的爱国情怀；生活的磨难，砥砺了他的刻苦精神。他笔下之马大都是自由驰骋的野马，其实是他自我人生的写照。他以哀伤孤寂之马，抒写凝望前路，孤独寂寞之我；以远眺前程之马，抒写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之我；以奔腾不息之马，抒写精神抖擞、豪气勃发之我。

1941年，46岁的徐悲鸿画了一幅《奔马图》，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第二次长沙会战。徐悲鸿忧愤挥笔，以一匹扬鬃奋蹄、一往直前、腾空狂飞之马，表达忧心如焚之情。他把中国的笔墨写意与西方的据实造型结合起来；他把国画的写意渲染与书法的用笔流畅结合起来。一扫“荒寒野逸”画马旧习，顿开雄奇刚劲凌厉之审美新风。他以他的刚劲画风振作国民精神。可以说，徐悲鸿马画是中国马画的里程碑。他的马画理论与实践，大大拓宽了中国马画，乃至世界马画的审美空间。（《光明日报》）

播报

稷山县文保中心
安全培训、应急演练同发力

运城晚报讯（记者刘亚）4月13日上午，稷山县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县消防救援大队在蔡村乡开展文物安全培训及应急演练活动。同时，为基层文保员发放“文物撑伞人”守护包。

在山西省文物局的支持下，中华思源工程基金会和哔哩哔哩网站等社会力量，共同发起“文物撑伞人守护计划”，为基层文保员捐赠冲锋衣、强光手电筒、帽子、手套等日常巡逻必备物资，以及创可贴、消毒棉棒等卫生用品。

稷山县文保中心相关负责人与该县消防救援大队商谈，将各乡镇“文物撑伞人”守护包发放仪式、文物安全培训及应急演练活动同时举办。

稷山县文保中心与该县

消防救援大队计划先后前往蔡村乡、稷峰镇等7个乡镇开展相关活动。预计在4月22日前，完成全县7个乡镇基层文保员的文物安全培训与“文物撑伞人”守护包发放工作。

培训现场，蔡村乡政府相关负责人和各村文保员、大学生村官观看了文物古建筑场所消防安全指导影片。稷山县消防救援大队宣传员周伟对文物古建筑场所消防安全隐患特点进行了详细讲解。随后，周伟现场演示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并指导参训人员进行消防器材实操演练。

稷山县文保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的举办，为筑牢文物安全“防火墙”奠定了坚实基础。

灭火器
蔡村乡基层文保员学习使用

文史拾零

日常俗语“上当”的权威解释

□许晖

“上当”是指中了别人的奸计而受骗吃亏，尽人皆知，但是为什么把受骗吃亏叫做“上当”，就没有人能说得清了。

关于这个日常俗语的权威解释来自清人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归入“讥讽类”的“自上当”一条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清河富室王氏设质库于邑城，累世矣。代远，子姓繁，有仍拥巨费者，有仰此自给者，营业之事，则择一人主之。”

江苏清河王氏乃属盐业起家的世家大族，同时也经营“质库”。“质库”指把钱借给典押物品的人，以收取利息的店铺，俗称“当铺”。

王锡祺，字寿萱，光绪年间著名的编辑家，曾捐过一个刑部候补郎中，故尊称“观察”。王锡祺最有名的著作就是研究世界地理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这样一位学者，可想而知花费在当铺经营上的

精力十分有限。

王氏家族的人认为王锡祺主持当铺多年，一定收益良多，才会有更多的金钱用在刻书、藏书的事情上，就很嫉妒他。这些股东想了一个馊主意，把家里多余的东西都拿到当铺里去典当，预先估算的价格一定高于实际价值。当铺的伙计哪里敢驳回股东们自己定的高价呢，只好如数给付，一来二去，当铺的资本渐渐地被抽空。

“架本不足，寿萱则以假贷资挹注，久之，遂破产。时人为之语曰：‘清河王，自上当。’盖质库一曰典当，俗谓质物曰‘当’，为人所欺曰‘上当’。王氏之当，非寿萱一人所设，族众亦主人，而各以己物往质，故为‘自上当’也。”

由此可见，清代民间早已把典当物品给当铺而被当铺所欺或者当铺被典当者所欺称为“上当”，不过，王锡祺的“上当”却属于被自己家族所欺的“自上当”，可谓异数。

（《天津日报》）

生活史

民国时在国内旅行也需办护照

□李开周

1927年冬天，学生放寒假，广州学生联合会向省政府提交了一份申请，大意是说学生们组织了一个宣传队，成员共有三四百人，计划趁寒假期间分赴广东各地宣讲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建国大纲，请省政府通知有关部门为他们免费办理护照。这些学生又不需要出国，为什么要求有关部门给他们免费办护照呢？

其实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前期，“护照”这个词并不仅仅是出国时的护照，还包括在国内旅行时所用的通行证，学生们办的是后一种护照。

如果我们穿越到民国前期，

哪怕不出国，只是在国内或者省内来回走走也必须办理一大堆护照，否则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例如警察盘查、卫兵搜身、旅店老板不敢接待之类。

在民国前期，中国虽然在名义上是一个统一国家，实际上山头林立、群雄割据，一国被人为割裂，所以在国内旅行也需要护照。直到1931年1月，立法院颁布了一部《护照条例》，取消了以前那些五花八门的国内护照，从此“护照”一词才真正具备了现代意义。

按《护照条例》规定，普通国民如需出国，须向当地政府申领护照。申领时填写一份《请领护照事项表》，一份《请领出国护照保结书》，交三张四英寸的半身

照，并缴纳护照费和印花税若干。少则四五天，多则十余天，就可以拿到护照了。当时护照是三联式，一联给使用人，一联存当地政府，另一联交外交部备案。

《护照条例》上说，护照费是两块大洋（学生与工人半价），印花税也是两块大洋，但学生减半，劳工则只收三角。该条例还明确规定：“发照机关不得于此等费用外另收他费。”

两块大洋的护照费，两块大洋的印花税，加起来总共四块大洋。如果按1931年大洋在广州市区的购买力估算，四块大洋相当于现在人民币两百多元，跟今天的收费标准差不多。

（《湛江晚报》）